

“农民意识”的文化心理模式分析

但昭明

(华中农业大学 政治与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0)



摘要 要避免“农民意识”批判本身又陷入农民意识的怪圈,有必要超越农民意识外在的价值表现,挖掘其背后隐性的文化心理模式:在中国人传统天人合一式的思维结构中,“自我”与“对象”之间存在的认识论“颠倒”被习惯性地回避,难以凝练出精神性的自由人格。其结果要么沉溺于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世俗伦理,要么停留于空洞的自然状态,放弃个体生命的成长。在以市场经济为背景的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心理模式分析为克服市场异化、培植市民意识发挥着新的思想启蒙的作用。

关键词 农民意识;文化心理模式;自我意识;市场经济;启蒙

中图分类号:G 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456(2014)03-0104-06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起传统文化批判以来,“农民意识”也一直处于争议的漩涡之中,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从农民意识向市民意识的转变开始成为一种文化自觉。而吊诡的是,当我们一面批判农民意识的时候,一面又存在难以割舍的“农民情结”。这种爱恨交加的矛盾心理恰好表明:我们的“批判”本身在理论上是难以自洽的,乃至这种“批判”本身又有可能沦为一种农民意识。问题的关键在于,当前的批判还停留于农民意识的诸多表层价值观念之上,而尚未深入到背后隐性的文化心理模式。在农业文明通往工业文明的进程中,唯有深刻反思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拷问农民参与市场经济的主体合法性,从文化上真正推进“人的现代化”,才能从根源上解决不断涌现的“市场乱象”。

一、“农民意识”的内涵解析

如果“批判”本身必须预设一个明确的靶向,那么就有必要明确“农民意识”的核心内涵。然而,对于农民意识之内涵的理解还存在诸多偏差,并使得农民意识之“批判”陷入混乱之中。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可以武断地选择其中之一来进行批判。批判对象的选择在于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批判,以及这种批判本身的意义之所在。因此,有必要梳理当前有关农民意识的界定。其目的在于,由批判对象出发预

期可能获得的批判效应,并藉此明确批判的目标指向。就学界目前的研究来看,农民意识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种。

其一,所谓“农民意识”就是农民的意识,即千百年来直至今天仍然存在的以务农为生的人所秉持的意识,这里的“农民”,无疑代表的是一种职业身份,或者说是 farmer,而非 peasantry。在英文中,farmer 指的是“种田人”,在职业身份的界定上是中性的,并不存在某种价值附加,这就意味着,即使在城里的人如果改行务农,也是一个 farmer;相反,peasantry 则无关乎职业身份,而是农业文明世代形成的特定价值观念的载体,即便一个从事工商业的人,如果没有摆脱农业文明的价值观念,那么他也是一个 peasantry。如此一来,当我们批判这种农民意识时,矛头便不是指向意识本身,而是农民这一意识主体。因而,只要是一个农民,不管其意识状态是否具有先进性,就已经成为批判的对象了。这种批判虽然隐含着农业生产方式对农民这一职业群体意识的影响,但如果不考虑意识本身的历史传承及其相对独立性,它便会沦为一种“职业歧视”。

其二,认为农民意识是传统农业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与农业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因而也是一种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体意识。这种界定强化的重点在于“意识”本身,并因此也使得“农民”这一概念获得了一种价值附加,此时的农民不再

是 farmer, 而是 peasantry。按照这种理解, 农民意识批判实际上就是一种价值批判。但问题并没有因此变得简单, 因为这一群体价值观念的两面性(既有传统精华, 也有“封建糟粕”)使得批判本身丧失了合法性。破解这一问题的杀手锏自然就是所谓“一分为二”“辩证地看待”, 或者一个更为简单彻底的方法就是直接在农民意识的内涵中添加一个“落后”的限定词, 剩下的任务就是如何区分“先进”与“落后”了。

这种价值批判自然有其合理性, 在中国这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现代化的过程中, 农民意识批判甚至可以泛化为一种国民性批判, 一度发挥着一种思想上的“启蒙”作用。但时至今日, 国人对“启蒙”的理解并没有获得“正本清源”。启蒙(enlighten)本义为光明、光照, 在西方现代化的过程中, 启蒙也喻示着用理性之光驱散中世纪的蒙昧与黑暗。然而, “理性”却并不意味着某种现成的与“封建迷信”相对立的“科学思想”, 而是一种价值观念的诉求方式, 即批判依靠专制政权所获取的“语言霸权”, 强调理智、自由地表达思想, 正如康德所讲“启蒙是为了使人类走出一种自我造成的不成熟状态, 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 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可见, 启蒙不是用一种价值观念来批判或替代另一种价值观念, 农民意识批判要想真正发挥启蒙作用, 绝不能将农民摆在“受教育者”的地位, 要求他们“只许科学, 不许迷信”, 这恰恰是对启蒙的背离。将“农民意识”的内涵局限于某种价值观念, 随之而来的批判或许客观上有利于提升整体的国民素质, 但却加深了他们的“不成熟状态”。

鉴于此, 有必要厘清对农民意识之内涵的理解, 将其看做一种“文化心理模式”。所谓文化心理模式, 也称文化心理结构, 是某一特定的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 是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念(甚至是相互对立的)背后共同的支撑点。农民群体的价值观念是显性的, 也是历史性的、多样化的。描述农民群体的价值观念有许多词语, 比如勤劳、简朴、安分、守旧、注重血亲、崇尚乡土、小富即安、平均主义等等。值得注意的是, 每一种价值观念只是作为一套价值体系的农民意识的某一方面, 而这种经验归纳的方式显然不能穷尽其整套价值体系, 这就意味着必须挖掘显性的价值观念背后更为隐秘的东西, 也就是文化心理模式。相比价值观念的历史性与多样性, 文化心理模式是深

层次的、较为固定的, 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处处存在, 但又处于不知的状态。即便我们批判了某一价值观念, 如果不消除其背后的思维模式, 那么它还会变相地再次显现。因此, 只有从文化心理模式的层面来理解农民意识, 才能真正把握这一概念的独特内涵, 针对它进行的批判才更为彻底。

这就意味着, 必须将“农民”这一职业身份及其所包含的价值悬置起来, 而仅仅看做几千年来中国人思维积淀的一种客观呈现。因而, 对“农民意识”的界定并不在于口头或字面上的价值诉求, 而在于话语背后隐性的思维模式。如果中国人至今仍然受制于这种思维模式, 那么我们当然有理由将他们称之为“农民”。因此, 正确理解“农民意识”有待于揭示其背后隐形的思维模式。

二、文化心理模式的二元结构分析

意识是“自我”与“对象”之间的一种关系, 这就必须将文化心理模式纳入到一种二元结构分析之中, 以试图解决的问题是: 自我与对象之间的矛盾如何成为推动人类步入现代文明的内在动力?

任何一种文化在其发源之初都处于一种物我不分的混沌状态, 自我与对象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界限。然而, 作为一个“人”, 就必须具备自我与对象的区分意识, 真正意义上的“天人合一”只能是一种“无意识”状态, 正是在此意义上, 黑格尔用“自我意识”代表“人”。当然, 自我意识成立的前提又必须是“对象意识”, 即意识到外在于自己的对象的存在, 否则, 自我便是没有边界的。

一种文化的开启缘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 这鲜明地表现在西方文化的演变过程中: 自古希腊开始, 西方文化就呈现出自我与对象之间分离与抗争的态势: 如果说在旧的泰坦神系中巨人族还没有摆脱自然的羁绊, 那么在奥林匹斯新神系中, 神的形象已经从自然界中提升出来, 此种趋势在苏格拉底的理性神以及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中进一步获得了哲学上的理性表达, 开启了西方文化相互对立的两级世界。这一传统在中世纪宗教生活中持续发酵, 用一千多年的时间纯化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近代以来, 由文艺复兴所引发的“两大发现”使得西方哲学关注的基本问题转移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也就是探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 至此, 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真正获得了一种认识论层面的文化自觉。

然而, 在这种认识论模式的背后隐含着一种深

层次的生存论关系。一方面,主体的存在维系于对客体的追问,只有从客体(Objection,在英文中也指“对象”,即与主体“迎面而对”)中才能发现自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这种“对象意识”意味着,必须把对象看成自我,或者说对象就是一面镜子,可以反射出自我,这种反射毋宁说是一种反思(reflect,英文中也指“反射”),即在非我的、异化的经验世界中不断地凝练出自我。正如黑格尔所说:“经验则被认为恰恰就是这个运动,在这个运动中,直接的东西,没经验过的东西,即抽象的东西,无论属于感性存在的或属于单纯的思想事物的,先将自己予以异化,然后从这个异化中返回自身,这样,原来没有经验过的东西才呈现出它的现实性和真理性,才是意识的财产”^[2]。所谓“意识的财产”即自我对异化的对象世界之经验活动的内化与积淀,以期告别“直接的东西,没经验过的东西”。另一方面,一旦我们将对象看做自我,这一“自我”本身又会成为一个“对象”,这就是“自我意识”,即自己将自己看做“对象”。如此一来,就会形成两个“我”:一个是追问的“我”,一个是作为对象存在的“我”。然而,如果这一对象恰好身陷囹圄,苟且偷生,又或者在现实的政治运动中唯唯诺诺,随波逐流呢?在对象化的世界中,我们无法避免这种异化的处境,然则,我们又何以容忍这一异化的“对象”就是“我自己”呢?

于是,因主客二分而形成的意识结构便呈现出一种颠倒:不仅将对象看做自我,还要将自我看做对象,从形式逻辑上讲,这难道不是一种自相矛盾吗?可见,人的意识结构从本质上就注定了要遭受这种自相矛盾,这种认识论上的颠倒所导致的恰是人之生存的悖论,一旦我们从懵懂未开的幼年成长为一个有意识的“人”,就免不了要遭受这种痛苦。马克思讲:“动物与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自己意识的对象”^{[3]57}。这种不断地将自我投射出去又返回自身的痛苦过程,正是人从动物式的“自然人”向具有人格意识的“自由人”成长的过程。

西方近代以来,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正是受惠于这种主客对立的文化心理结构,正如马克思所讲:“工业的历史和工业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3]388}。马克思敏锐地意

识到,工业伟绩的背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证明,这一历史性的运动在改造对象世界的同时,又提升了西方人的主体意识并开启了资产阶级所主导的市民社会。所谓“市民”,无非就是有人格意识的“自由人”,这也是西方社会民主政治建构的前提。在中国已在步入现代化,并建构起市场经济的现实语境中,我们当然可以在“中国道路”的口号下寻求自身发展的独特性。然而,不从西方文化这面镜子中反观自身,或是一味地诉诸“祖宗之法”,必然切断现代化之路自我生长的空间。我们或许没有必要学会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但绝对有必要追问: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形成这种思维模式?这种追问将导向对中国人文化心理模式的“心理学”分析,“如果心理学还没有打开这本书即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最容易理解的部分,那么这种心理学就不能成为内容确实丰富的和真正的科学”^{[3]89}。

三、超越农民意识:由自然而自由

文化心理模式的二元结构分析表明,自我与对象的认识论颠倒所激发出的超越性,促成了人从自然状态向自由状态的提升,这正是超越农民意识的关键所在。对于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衍生的价值观念,我们可以很便捷地采取“拿来主义”,但文化心理模式的变更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因而,超越农民意识将是一个痛苦、漫长的过程。首要的工作在于,对中国几千年来积淀的文化心理模式予以彻底的反思。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文中认为,雅典国家的建立,推翻了原始氏族制度最后的残余:“代替他们的是一种全新的组织,这种组织是以曾经用诺克拉里实验过的只依居住地区来划分公民的办法为基础的,有决定意义的已不是血族团体的族籍,而只是常住地区了”^[4]。中国人传统的国家观念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始终缺少这样一种对象化的中介,而是一种自然的、直接的状态。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如果说孝敬父母还需要理由的话,那只是因为我们是父母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这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情感,并且,正因为它是自然的,才称得上是真情实感,否则就是一种“人为”的造作。李泽厚先生也讲,中国文化是一种“情本体”:“不是‘性’(‘理’),而是‘情’;不是‘性(理)本体’,而是‘情本体’;不是道德的形而上学而是审美形而上学,才是今日改弦更张的方向”^[5]。然而,在中国人习惯自然的情感背后,并不存在一个形而上的自由

意志发挥的空间,这就抽掉了道德建构的活水源头,只是停留于自然的伦理关系中,即便是在国家层面,它也是家庭伦理的放大,忠君不过是对皇帝这一大家长的尽孝。可见,长期以来,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像西方人那样斩断自然形成的血亲关系,而是始终停留在天人合一的混沌状态。

而问题在于,天人合一本身却必须预设“天人两分”的前提,一个喜欢“较真”的人必然因这一前提而陷入一种认识论的颠倒。然而,传统中国人的心灵自然是不会被这种矛盾所困扰的,其制胜法宝便是无视这种分化,或是明知道有矛盾,却偏要保持一种“泰然任之”的心态。这种文化心理模式将外在于人的对象当做与自己不可分离的整体,即自我与外在世界具有一种“同质性”。因而,在人与人之间,我们强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人与对象之间,我们也习惯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比附,这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中国先民眼中的自然界总是充满了诗情画意。这种意识结构表明,在自我与外在对象之间,并没有形成一种绝对客观的“认识论”关系,其结果便是,自我始终受到外在对象的纠缠,沉溺于血亲性的经验世界和因果链条的自然世界之中难以抽身而出,获得自身的独立性。而外在对象也始终烙上了自我的印记,难以保证其客观存在,这使得我们无法形成理论性的自然科学,在宗教层面则停留于自然宗教与实用宗教的层面,尚未提升到真正的精神宗教。

于是,我们在儒道两家文化中都能看出这种文化心理模式所发生的催化作用。在儒家那里,自我一头扎进对象世界,试图从家国伦理中寻求安生立命的根本,这就是农民身上体现出的注重血亲,崇尚乡土以及忠孝意识。然而,这一外在世界毕竟是一种“非我”的存在,自我必然处于以血亲为基础的种种裙带关系的促逼之中。尤其是在传统“三纲五常”的关系框架中,我们自以为扮演一个好妻子、好儿子、好臣子的角色,就是尽到了自己的本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殊不知,根本不存在所谓“良心”的最终标准,它其实是自我意识不断反思的无底洞,其最终导向只能是一个尽善尽美的自我。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永远也达不到这一标准,这就表明,那些口口声声用“良心”作挡箭牌的人,其实质却是对自我的一种“终止追问”,以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来寻求心理慰藉,这也正是鲁迅先生在阿Q这一农民形象中为我们揭示出来的“精神胜利法”。

在道家那里,情况正好相反,自我因为“闭目塞

听”,摆脱了外在对象的束缚与羁绊,方能清心寡欲,超然独立,所谓“逍遥游”即是如此。老子主张“致虚静,守静笃”“复归于婴儿”,这种价值取向在农民身上表现出来就是老实、本分、纯朴、善良,与之相对的就是城府深、工于心计,这种人往往是不讨人喜欢的。然而,离开对象这面镜子,不从外部世界中汲取生命的营养,自我注定是空洞的,没有内涵的,只是停留在初始的“自然状态”。两千多年来,这种文化心理结构虽能保证自我的清高,实际上所造就的不过是永远也长不大的“婴儿”。我们越是欣赏这种无知式的“天真”,越是将自己拉扯回一种未经开化的自然状态,在“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中寻找所谓的“自由”。殊不知,真正的自由,恰在于“生命不可承受之轻”,在于鲁迅先生所讲的“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们固然可以用“活着就是王道”为藉口来“逃避自由”,其结果只能是一种自然层面的“活着”,精神上却没有“活起来”,这也是时下流行的那句“我是农民我怕谁”背后的潜在逻辑:一旦放弃个人尊严与社会担当,将自己“降格处理”,便可以无往而不胜了!

由此可见,正是从文化心理模式分析中,我们才能发现农民意识价值表现的内在根源,而这种分析又是从西方文化这面镜子中反思得来。在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中,自我与对象之间的冲突始终是一种挥之不去的幽灵,然而,这种看似负面的心理纠结却能够形成一股强大的生命力,迫使他们在一个异己的世界中去追问真实的自我,并由此提炼出精神性的自由“人格”。相反,在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中,因为回避主客对立,我们便可以获得一种心安理得,但这却是以终止自我生长为代价的。

四、市场经济的冲击效应

如果说“五四”以来对农民意识的批判,其矛头主要指向封建意识,那么在20世纪80年代思想大解放的背景下,对农民意识的批判,其要旨便在于呼唤一种市民意识了。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角度看,市民意识应该是市场经济在意识层面的衍生物,然而,从逻辑上看,市场经济的前提又是“市民”的存在,即具备人格独立、意志自由的责任主体,如此方能保证市场经济的“合法性”。近代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确立有其自身的天然优势:一方面,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及其政治势力相对薄弱;另一方面,自古希腊以来就存在的原子主义、理性思维以及中世纪宗

教生活对世俗伦理的超越为近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这就意味着:西方市民意识的形成有其思想发展的自身逻辑,市场经济的确立在一定意义上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当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时,除了直接“拿来”西方的市场经济之外,培植市民意识便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应该肯定的是,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对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冲击,激发了农民自主经营、自担风险的主体意识。20世纪90年代正式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这种主体意识进一步被放大,农民开始从自家的“一亩三分地”走出来,放眼整个大市场,遵循优胜劣汰的市场规律来指导自身的经营活动。对农民而言,这一新的生产关系所带来的变革在于:在必然的自然界及其衍生的血亲伦理之外,市场为其打开了一个具有无限可能性的世界,他开始暴露在一种“绝对孤独”的处境之中,面向一片虚无,无依无靠,然而,他又拥有全部自由去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他必须作出选择,非此即彼:要么畏惧、逃避这种自由,继续沉溺于“靠天吃饭”的必然性中;要么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自我世界的建构,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他怎样选择,他便成为怎样的人,他的选择决定他自己的命运。可见,市场经济并非必然地促成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而是提供了一种选择、一种诱惑,促逼着农民去自我否定。

马克思在批判印度的种姓划分制度时谈到:“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6]。马克思所谓“自我革命”无疑强调的是一种意识层面的觉醒,不如此,便只能被世界历史裹挟着前行,某种程度上,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也处于这种尴尬的处境中。即便是市场游戏规则的确立,对大多数“农民”而言,恐怕也只是充当了一种“发家致富”的外在工具,在意识层面,始终还亏欠一个“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的内化过程。我们习惯于将当前存在的诸多“市场乱象”归咎于制度的不完善,却往往忽略了我们自己作为市场主体之“合法性”的自我反思:在经受市场外化的第一次否定之后,还需抽身而出返回自身,如此,才能将这一外在的经验过程内化成意识的财产,从而确证自我的主体性,以免被外在对象所吞噬,沦为市场的俘虏。

对于中国人而言,无论是拒斥市场经济还是沉溺于市场经济,都堵塞了人的自我生成之路。前者陷于一种“对自然的野蛮崇拜”,后者固然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迈出了一大步,但又坠入一种拜物主义的困境之中,在思维方式上依然没有摆脱“农民”的角色定位。由此可见,市民意识与市场经济并不存在着必然的对应关系,单纯地依赖市场经济来冲击农民意识,这本身就避免不了“经济决定论”的嫌疑。马克思强调社会意识有其自身发展的独立性,需要尊重意识发展的自身逻辑,这也正是从文化心理模式上分析农民意识的必要性之所在。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缘于市场经济的推进,物欲横流、道德滑坡等负面效应引起人们的普遍忧虑,这一现象伴随着综合国力的上升,引发一股以“国学热”为代表的复古思潮的盛行,要求重拾传统的道德操守。事实上,传统道德之所以滑坡,更应该反思的是道德本身是否还具备生命力,以及如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吸收精华,改进创新。在复古思潮这一文化现象的背后,我们总能发现国人挥之不去的“农民情结”,它也表现在当前一系列“心灵鸡汤式”的文化套餐中,用一种“心理按摩术”将我们束缚在熟悉的“家乡世界”,在软绵绵的情感体验中继续软化着我们的生命力。康德曾经批判过这种“软化性质的激情”:

长篇小说,哭哭啼啼的戏剧,干瘪的伦理规范,都在卖弄着所谓的(尽管是虚假的)高贵的意向,实际上却在使人的心变得干枯,对于严格的义务规范没有感受,使任何对我们人格中的人类尊严的敬重、使人的权利(它是完全不同于人的幸福的)以及一般地使一切坚定的原理都不可能;……还有虚假的谦恭,它以自我藐视、即用摇曳乞怜的伪装的忏悔和一味隐忍地内心克制来建立一种人们唯一有可能使最高存在者喜欢的行为方式:这些就连和那能够归于美的东西都不相容,更不用说与那可以算作心性的崇高的东西相容了^[7]。

两百多年前康德这番诗化的语言,恰到好处地反映出我们当下还在大行其道的农民意识。康德强调“要有勇气去利用你自己的理智”,在充分市场化的今天,是否有“勇气”去直面种种异化现象,从“他乡世界”中拷问自我,才是成为合格市民的关键。

五、结 语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对传统文化的反叛就已经触及到农民意识批判,然而,囿于时代条件的纷扰,尤其是救亡图存的急切心态,这种批判难以真正专注于文化心理模式本身,也未形成一套超越性的理论建构。建国以后,集体主义成为改造小农意识的思想武器,但经济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反而窒息了个体的能动性。改革开放掀起了解放思想的热潮,并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为个体生命敞开了一个自由开显的广阔天地,旧有的家园面临市场的强势冲击,农民被迫在痛苦的抉择中开启自我拷问。

不难发现,近一百年来,历次的农民意识批判总是受制于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经济发展的大环境。然则,一味地紧扣时代的脉搏,便有可能被历史拖拽着前行,因而,在尊重社会存在的基础地位的同时,更要发挥意识活动的主导性作用,在具体的政治、经

济实践活动之前,做好思想上的准备。就此而言,农民意识批判仍然有待于继续推进,尤其是要敢于超越当下时代所既定的种种生产模式及其衍生的价值观念,从文化心理模式上予以深刻的反思,这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思想启蒙,需要漫长的历史过渡。

参 考 文 献

- [1] [德]康德. 康德书信百封[M]. 李秋零,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268.
- [2] [德]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上)[M]. 贺麟、王玖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3.
- [3] [德]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4] [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4)[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34.
- [5] 李泽厚. 世纪新梦[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27.
- [6] [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66.
- [7] [德]康德. 判断力批判[M], 邓晓芒,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13-114.

An Analysis of Cultural Psychological Models on Peasantry Awareness

DAN Zhao-ming

(Research Center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To avoid the vicious circle that the criticism of *peasantry awareness* sinks into the peasantry awareness again, it's necessary to transcend the external value expression of peasantry awareness, and disclose the recessive cultural psychological models behind peasantry awareness; The epistemological reversal between *self* and *objection* has been neglected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thinking structure that ma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e, therefore, it's difficultly to cultivate the immaterial free Person. As a result, they sank into the temporal ethics based on consanguineous relation, or rested on barren natural state, and gave up the growing-up of individuality.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based on market, the analysis of cultural psychological models serves as an enlightenment to overcome market alienation and cultivate citizen awareness.

Key words peasantry awareness; cultural psychological models; self-awareness; market economy; enlighten

(责任编辑:张 艳)